

儒家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

李克建◆著

民族出版社



西南民族大学优秀学术文库

儒家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

李克建◆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家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李克建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 - 7 - 105 - 14359 - 7

I. ①儒… II. ①李… III. ①儒家—民族观—
研究—中国 IV. ①B222.05 ②C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12651 号

策划编辑: 虞 农

责任编辑: 朴雪梅

封面设计: 金 晔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mzpub.com>

印 刷: 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 205 千字

印 张: 10.625

定 价: 30.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4359 - 7/B · 748(汉 260)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010-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64224782

前 言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各民族经历无数次的大动荡、大迁徙、大分化、大改组和大交融，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日益结成血肉相连、唇齿相依、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最终从“多元”走向“一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对中华文明进行深刻反思，其中尤其令人深思的一个话题就是“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古代中国人当时究竟是怀着怎样的一种人文价值和心态，才能包容四海之内如此众多的族群和观念迥异的文化，最终建立起一个‘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中国”。循着费老的思路去思考，借着前辈的耕耘去探索，在我的导师陈玉屏教授的指点下，我从攻读博士学位起便开始寻求答案，这就是本书最初的写作动机。

众所周知，中华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学不仅在先秦时便成为“显学”之一，而且从两汉迄清，一直居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对中华各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聚合作用。古代中国人长期置身于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社会现实中，对于异民族和异文化自有自己的思考逻辑，儒家民族观可谓对中国古代国家发展和民族形成影响最深远者。儒家民族观，简言之，就是指孔子、孟子和荀子等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现实和民族情势，提出一系列认识民族现象、

解决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主张和基本准则。儒家民族观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天下观念”和“大一统”思想为理论前提，以“仁”学和“礼”治为理论支点，在对待夷夏问题上，具有这样一些基本观点：第一，在区分夷夏问题上，儒家确立了“礼别华夷”的区分标准，“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夷夏之别在于文化，“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这样就巧妙地将民族差别转换为文化差别，有利于促进夷夏之间的民族交融；第二，在对待民族发展问题上，儒家一方面受早期夷夏观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华夷之辨”思想，讲“夷夏之防”和“尊王攘夷”，另一方面又受“礼别华夷”和“有教无类”思想的影响，大力提倡“用夏变夷”和“华夷一体”；第三，在认识民族发展规律上，儒家建构了以“春秋三世说”和“五服制”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时空观念，从一个新的维度赋予“天下”和“大一统”以新的内涵。总之，儒家民族观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对立的统一体，排他性和包容性，保守性和开明性，原则性和灵活性融于一体，在不同的时代彰显出不同的特征，演奏出不同的音符。

儒家民族观是儒家思考民族问题的结果，也是时代的产物。伴随着儒学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儒家民族观不断发展、丰富和完善，在两千多年的传承中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纵观儒家民族观的发展演变历程，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1）儒家民族观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孟子和荀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民族思想构成了儒家民族观的基本内容。（2）两汉时期，随着儒学被奉为官方哲学，儒家民族观也逐渐居于主流意识形态地位，两汉“大一统”的政治现实为儒家民族观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大一统”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得以确立并随儒学传播逐渐深入各族人民心中。（3）魏晋南北朝是儒家民族观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中国北方、西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建立政权，既打破了传统的民族分布格局，又打破了传统的政治博弈格局，从而促使人们的民

族观开始发生变化。汉族统治集团表现出强烈的抵抗心理，“夷夏大防”和“攘夷”、“徙戎”的呼声不断高涨，但是迫于“夷狄主政”的现实，汉族往往又只能选择退让和妥协；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后，一方面积极“认祖归宗”以示“正统”，主动学习儒学以缩小夷夏之间的文化差距，一方面又心存“卑怯”，对汉族具有戒备和防范心理。夷夏双方在抗争中不断妥协，在焦虑中不断调适，在排斥中不断交融。(4)隋唐是儒家民族观获得较大发展的时期，“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促使“大一统”的民族观和国家观进一步发展。以“安史之乱”为时间节点，“用夏变夷”和“华夷一体”是唐朝前期民族观的主旋律，而“华夷之辨”和“华夷之防”则是唐朝中后期民族观的主旋律。(5)宋辽夏金是儒家民族观发展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时代，宋代理学思想对儒家民族观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传统的“华夷之辨”和“正统之争”受到“道统”思想的挑战，人们对“华”和“夷”的内涵理解发生了转变，儒家民族观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6)元明清时期，由夷和夏共同创造的“大一统”局面促使儒家民族观进入充分发展时期，经历六百多年的发展，夷夏之间在碰撞中不断交融，到清朝中期，传统的“华夷之辨”思想逐渐让位于“华夷一体，天下一家”，中华各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步伐日益加快，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呼之欲出。

综观儒家民族观的基本观点和演变历程，其理论价值自然显现。毋庸置疑，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儒家民族观的合理内核和文化因子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9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说：“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回到费孝通先生晚年对中华文明的深刻反思，我想我要寻找的答案已经浮出水面。

本书分为七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导论部分陈述了本研究的选题缘由和选题意义；对国内学术界在古代民族观领域的研究成果做了较为详细的梳理；介绍了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第一章主要对先秦时期的华夷格局和中国早期夷夏观的产生进行了分析。从远古传说时代起至秦并六国完成一定规模的统一之前，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长期处于邦国林立的“万邦时代”，无论是早期国家和民族的产生，还是民族观念与民族分布格局的初步形成，都源于这个时代。由“华夏”和“四夷”构成的“五方之民”是先秦时期华夷格局的真实写照；“华夷之辨”和“华夏中心主义意识”既是早期夷夏观的主要内容，也是儒家民族观的直接来源。

第二章主要对儒家民族观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来源进行探究。“天下观念”和“大一统”思想是儒家认识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的宏观视野和理论前提，“仁”和“礼”则是儒家民族观的理论支点和逻辑起点。正因为儒家具有宽广的天下情怀和博大的仁爱之心，才滋养出相对进步、开明、包容的民族观；正因为儒学理论博大精深、生生不息，才使得儒家民族观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一脉相承、绵延千年。

第三章重点分析儒家民族观的基本内容和理论特点。儒家民族观是由一系列相反相成的民族思想构成的一个矛盾统一体，它一方面确立了“礼别华夷”的民族区分标准，主张以“用夏变夷”的方式实现“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政治局面；一方面又在“华夷之辨”思想的支配下强调“华夷之防”和“尊王攘夷”。同时，儒家还以“春秋三世说”和“五服制”为基本内容，建构起独特的民族时空观念，同时将“夷夏差别”巧妙地消泯于文化距离之中，对“天下”和“大一统”做了新的阐释。

第四章主要梳理儒家民族观的历史演变进程。儒家民族观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理论形态的每一次变化和飞跃，都深刻地

影响着儒家民族观的发展和变化。儒家民族观的发展演变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春秋战国是儒家民族观萌芽时期，两汉是儒家民族观初步发展时期，魏晋南北朝是儒家民族观重要变化时期，隋唐是儒家民族观进一步发展时期，宋辽夏金是儒家民族观新发展时期，元明清是儒家民族观充分发展时期。其中，西汉儒学取得官方地位和宋代道统思想对儒家民族观的发展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

第五章主要探讨儒家民族观对中国古代民族政策制定原则及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主流之形成的历史影响。儒家的“大一统”政治观和“仁爱”思想衍生出封建统治者制定民族政策所遵循的“臣属原则”和“怀柔原则”，并在“怀柔原则”影响下制定了独具特色的“羁縻政策”。中华各民族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日益接近、互相吸取、互相依存，聚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共同缔造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与儒家民族观对古代民族关系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和文化层面的深刻影响密不可分。

结语部分主要对儒家民族观合理的价值内核和积极的文化因子进行再认识。儒家民族观是时代的产物，自然有时代的局限性，我们不应该过于苛责和放大它的局限性，而应该从今天的时代要求出发，积极挖掘儒家民族观重“仁”、讲“礼”、贵“和”的理论价值和当代意义。儒家民族观作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更应该以理性的态度对它进行“扬弃”和“改造”，让它的合理内核变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将它构筑成中华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最后，借本书付梓之际，特别感谢我的导师陈玉屏教授，同时也向所有帮助、支持本书出版的人们表示衷心感谢！

目 录

导 论	(1)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1)
二、研究现状	(7)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37)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华夷格局与中国早期夷夏观的产生	(40)
第一节 华夏族的形成与先秦时期的华夷格局	(41)
一、“万邦林立”与民族产生	(41)
二、文化与民族形成：以华夏族为例	(46)
三、“五方之民”：先秦时期的民族分布格局	(54)
第二节 早期夷夏观的基本内容	(59)
一、先秦时期“族”字含义的演变	(59)
二、早期的“华夷之辨”	(63)
三、早期的“华夏中心主义”意识	(67)
第二章 儒家民族观理论探源	(71)
第一节 儒学与儒家民族观	(72)
一、“儒”与“儒家”之关系	(72)
二、儒家民族观的产生	(74)
第二节 儒家政治观与儒家民族观	(76)
一、“天下观念”与儒家民族观	(76)

二、“大一统”思想与儒家民族观	(80)
第三节 儒学核心思想与儒家民族观	(85)
一、“仁”学与儒家民族观	(85)
二、“礼”治精神与儒家民族观	(89)
第三章 儒家民族观的基本内容	(93)
第一节 儒家的民族区分标准	(94)
一、“礼别华夷”思想的由来	(94)
二、“礼别华夷”思想的内涵及表现	(96)
三、“礼别华夷”思想的影响及意义	(100)
第二节 儒家对民族发展的认识	(102)
一、“夷夏之防”	(102)
二、“尊王攘夷”	(106)
三、“用夏变夷”	(108)
四、“华夷一体”	(112)
第三节 儒家的民族时空观念	(115)
一、“春秋三世说”	(115)
二、“五服制”	(118)
第四章 儒家民族观的发展与演变	(125)
第一节 两汉时期儒家民族观的初步发展	(126)
一、董仲舒改造儒学及儒家“大一统”民族观的确立	(126)
二、儒家“大一统”民族观的发展	(133)
三、儒家“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思想的发展 ..	(142)
四、汉族因汉王朝而得名	(146)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民族观的重要变化	(148)
一、汉族统治集团民族观的变化	(148)

二、少数民族统治者民族观的变化·····	(157)
第三节 隋唐时期儒家民族观的发展·····	(168)
一、隋唐“大一统”民族观的发展·····	(168)
二、隋唐“华夷有别”思想的体现·····	(177)
三、“华心说”：唐代“礼别华夷”思想的发展·····	(181)
四、隋唐“用夏变夷”与“华夷一体”思想的发展·····	(184)
第四节 宋辽夏金时期儒家民族观的发展·····	(193)
一、“道统论”缘起及其对民族观的影响·····	(193)
二、宋朝汉族统治集团民族观的变化·····	(197)
三、少数民族统治者民族观的变化与发展·····	(209)
第五节 元明清时期儒家民族观的发展·····	(224)
一、元代：空前大一统格局下儒家民族观的发展与变化·····	(224)
二、明代：儒家民族观在复归汉族的“大一统”局面中发展·····	(241)
三、清代：儒家民族观在新的大一统格局中发展·····	(257)
第五章 儒家民族观对中国古代民族政策及民族关系的影响·····	(276)
第一节 儒家民族观对古代民族政策制定原则的影响·····	(277)
一、“大一统”视野下的臣属原则·····	(277)
二、“仁爱”思想浸润下的怀柔原则·····	(282)
三、怀柔原则的集中体现：羁縻政策·····	(285)
第二节 儒家民族观对古代民族关系主流的影响·····	(296)
一、儒家民族观对民族关系政治层面的影响：“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各民族共同维护祖国统一·····	(296)

二、儒家民族观对民族关系经济层面的影响：农业经济与 畜牧经济互为补充，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依共存……	(300)
三、儒家民族观对民族关系文化层面的影响：强化了中华 民族整体认同感，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培育了民族 精神……	(303)
结 语……	(309)
一、对儒家民族观发展历程的回顾……	(309)
二、对儒家民族观核心价值的再认识……	(311)
主要参考文献……	(316)

导 论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这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多民族国家里，各民族经历了无数次的大动荡、大迁徙、大分化、大改组和大交融，最终走向了大统一和大发展，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日益结成了血肉相连、唇齿相依、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去你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割的多元一体。“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分分合合，纷争不断，但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大趋势是整个历史发展的主线。”^①如今，当我们看到世界上无数国家、民族、宗教和文化冲突不断、纷争不已时，更加感受到中华民族走到今天的来之不易，也更加体会到中华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凝聚力。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是各民族历数千年的风云变幻、经数十个朝代的更迭替换和无数次异质文化的碰撞交融共同书写出来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风雨不动、坚如磐石、岿然屹立、意气风发，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之所以能够一脉相承、绵延不断数千年，无不源于博大精深、包容万干的中华文化。众所周知，中华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

^① 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见《费孝通在2003：世纪学人遗稿》，18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文化对中华各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对中华文明进行深刻反思，就是希望我们对古代中国独特的社会机制、文化基础和思想基础进行深入研究，以回答萦绕在他心中和所有中国人心中的疑问：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古代中国人究竟是怀着怎样的一种人文价值和心态，才能包容四海之内如此众多的族群和观念迥异的不同文化，最终建立起一个“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中国？儒家文化究竟有哪些因素能够克服古代各民族之间的种种障碍，最终促使各民族结成彼此依存、难以割舍的民族关系？可以说，本研究的目的就是尽力探讨和试图回答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这些问题。

我们知道，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不少学者都在探究“民族”一词的由来问题，其中较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观点主要有如下两种：一是多数学者从中国近代文献、书刊中搜索到“民”、“族”二字连用的情况，认为具有近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最早于 19 世纪末由日本传入中国，普遍使用则是在 1903 年梁启超将瑞士—德国政治理论家、法学家布伦齐利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以后的事情。^① 这种观点为多数人所接受，如我国著名民族学者林耀华、牙含章等持有此种观点，可见这种观点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二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部分中青年学者在爬梳古籍中也搜索到“民族”一词的出现和由来。如青年学者茹莹认为，“民族”一词最早见于唐代李筌所著兵书《太白阴经》之序言，其中“智人得之以守封疆，挫强敌；愚人得之以倾宗社，灭民族”一语中的“灭民族”可解释为“灭国亡族”之意，并认为这是“民族”一词在中国语境中的最早出处。^② 后来又有学者认为《南齐书》卷 54《高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302 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② 茹莹：《汉语“民族”一词在我国的最早出现》，载《世界民族》，2001（6）。

逸传·顾欢传》所载“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中“民族”一词的含义与我们今天所说所用之“民族”一词的含义几乎相同。^①由此可见，人们对于“民族”一词的最早由来及其含义尚存争议。毋庸置疑，在古代中国，人们对于“民族”这一历史现象的认识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尤其是先秦文献中频频出现的“蛮”、“夷”、“戎”、“狄”、“华”、“夏”、“蛮夷”、“戎狄”、“华夏”、“诸夏”等字词及其相关记录，还有儒家经典中关于“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的精彩描述，表明古人早已具有了区分“我族”与“他族”的族类意识，即具有了早期的民族思想和民族观念。^②

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社会历史现实，这为中国早期民族思想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从古史中的“万邦时代”到诸侯纷争不已的战国时期，再到秦汉以后或统一或分裂的多民族国家，几乎每一个政治实体都面临着如何处理境内各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及其与周边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这就使得历朝历代各族统治者和民众的民族观问题成为我们关注的对象。那么，对于时间跨度如此之大、内容涵盖面如此之广的古代民族观领域而言，我们应该从何入手进行研究呢？笔者历来赞成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去观察和分析事物，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去认识问题。众所周知，中华文化丰富多彩，中华思想博大精深，但是儒学在中华文化宝库里占据的主导地位和深远影响不容置疑，它不仅在先秦时期成为“显学”之一，而且在两汉至清代的长时段里一直居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对我国古代社会的各个层面影响至深，其中包括它对古人民族观的深远影响。“民族观，是人们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总的认识和根本看法，

① 邱永君：《“民族”一词见于〈南齐书〉》，载《民族研究》，2004（3）。

② 在本研究中，为了便于从宏观上把握中国古代民族观（或民族思想）的发展演变历程，故没有严格区分“民族思想”和“民族观”的范畴，如无特殊说明，一般情况下认为这两个概念可以通用或互换。

它是世界观在民族问题上的反映。民族观一方面表现为人们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看法，另一方面又反映在人们处理民族关系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和方法上。”^①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关于民族、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看法和主张中，儒家的论述最为丰富，影响最为深远。张岱年等认为“中国古代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理论，最早见于《尚书》之《尧典》和《禹贡》”^②，此说不无道理。周伟洲也认为“中国过去几千年当政者处理民族关系和执行的民族政策，追根溯源，还是扎根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民族观的沃土中，而萌芽形成于先秦时代”^③。笔者认为，儒家文化虽然并不等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但却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主要体现。检诸史籍，历史上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各类人物，上至统治者下至普通民众，包括各族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史学家和文学家等，都留下了关于中国古代民族、民族问题及民族关系的各类论述，这些论述都或浅或深地打着儒学的烙印。因此，抓住对儒家民族观内涵及其发展演变历程进行深入研究的重心，就抓住了对中国古代民族观进行研究的关键环节，我们可以据此窥探中国古代民族观的概貌及发展脉络。

儒家民族观萌芽于先秦时期，直到清代发展成较为成熟和完善的理论，其在历史上的纵向发展和演变，与其在内容上的横向拓展和丰富，共同构成了儒家民族观不断完善的思想体系。儒家民族观以儒学思想及其基本精神作为理论渊源和思想基础，在不同的时代赋予其不同的特征：从先秦时期提出“协和万邦”、“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尊王攘夷”、“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到唐代

① 青觉：《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1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②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论争》，6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③ 周伟洲：《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民族观》，载《民族研究》，1995（6）。

提出“夷狄亦人耳……不必猜忌异类”，“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再到明清时期提出“华夷本一家”、“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者，皆朕赤子，岂有彼此”、“满汉一家”等思想，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儒家民族观带有强烈的“对立统一”特点，它既包含了“华夷之辨”、“夷夏对立”、“夷夏大防”的对立观念，又包含了“用夏变夷”、“华夷一体”、“华夷一家”的统一思想。在不同时期的具体民族情势下，其对立面和统一面会发出强弱不同的声音、高低各异的音调，但是从儒家民族观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对立的观点在渐渐弱化，而统一的思想在逐渐增强。

儒家民族观对中国古代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的影响很大。民族观不仅直接反映了人们对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根本观点和态度，更重要的是它往往是统治者制定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进而成为影响民族关系和统治效果的重要因素。例如，中国古代民族政策体系中的和亲政策、册封政策、怀柔政策、招抚政策、“因俗而治”等政策对当时及后世的民族关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政策的思想精髓无不打着儒家民族观的深深烙印。纵观历史上各民族的发展趋势和民族关系的主流，翁独健先生颇有见地地指出，自先秦至清代，“各民族之间既有矛盾斗争，又互相联系和日益接近；既有各自的民族特点，又日益形成着他们间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共同点；既分别存在和建立过不同的国家政权，又日益趋向于政治的统一和建立统一的国家。这些不同的因素和趋向交替的发生作用，使我国历史反复出现着统一、分裂而又复归于统一的现象”，民族关系主流是“各民族日益接近，互相吸取，互相依存”。^① 这些历史现象不是偶然出现的，它与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和古人的民族观念密切相关，个中的深层次原因值得我们深入分析和不断探究。

① 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1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